峥嵘岁月

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纪实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China

峥嵘岁月

——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纪实

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华侨组　编

21144824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1144824

责任编辑：谭　湘

峥嵘岁月

——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

全国政协文史资料

研究委员会华侨组编

*

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*

1988年1月第一版·1988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　印张：9.75　字数：250千字

印数：1—5000册

ISBN7—5034—0020—X/K·0020

统一书号：11224·266　　定价：2.40元

序　　言

张　楚　琨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，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，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。

历史的经验证明：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，是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实行国共合作，联合爱国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，团结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知识界和产业界英勇奋斗的结果。其中华侨的救亡御侮，输财助战，也为抗战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。

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。50年前，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儿女遍布五大洲，达1200多万人（当时中国政府采取双重国籍，不管是华裔、华族都算华侨），而南洋（地理上包括马来半岛、荷属东印度、菲律宾、暹罗、越南、缅甸、北婆罗洲）的华侨就有800多万。这是遍布在五大洲中的华侨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。华侨爱国领袖陈嘉庚，团结南洋800多万华侨，建立起救亡助战的组织——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（简称“南侨总会”，主席陈嘉庚）。南侨总会办的第一件大事是输财。陈嘉庚先生说，1939年，国家战费开出国币18亿元，华侨外汇汇款包括赡家和义捐达国币11亿元。第二件大事是号召华侨青年回国助战。华侨青年认识到：“敌人要我们每个人，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。我们要求生路，便只有抗战，便只有坚持抗战到底。这时代是战斗的。这时代不能与过去‘五四’、‘五卅’、1925年大革命时代相比，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，这一次却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战。”（周恩来：《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》）因此，千千万万的华侨

青年掀起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回国参战的高潮。

一首由田汉作词、聂耳谱曲的《告别南洋》的歌，响彻了南洋各国各埠及其大大小小的岛屿。它沉郁、悲壮的歌词和曲调，激发了华侨青年的抗战热情。特别是唱到“你不见那尸横着长白山，血流着黑龙江，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”时，南洋各地的华侨青年，无不义愤填膺，热泪盈眶。为了祖国的兴亡，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，“到延安去”，“到抗日的前线去”的呼声便见诸行动了。华侨青年组成归国服务团、战地记者团、慰问队、工作队、医疗队等，回国到延安，到新四军，到东江，到琼崖，学习军事政治，进行战地服务，直至上火线杀敌。多少青年，有的单身一人，有的三俩结伴，远渡重洋，跋涉万里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几乎走过大半个中国，闯过国民党特务设置的重重障碍，才到达革命的目的地。那种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，是华侨有史以来所未见的。

我亲身经历这伟大的历史进程，观察到一些非凡的景象，并使自己在战斗中受到鼓舞和教育。当时我是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的编辑（副刊《狮声》主编）和评论员。两年多，我动员、联系到延安和新四军去的华侨青年有很多人。其中有几位到延安，受到了我在上海泉漳中学的同事艾思奇（当时他任教于延安马列主义学院）的接待。1939 年 3 月，我赴香港，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工作，会见了廖承志、李少石、连贯等同志；又访问了东江纵队的驻地坪山，曾生司令员介绍一些华侨青年和我座谈。同年 9 月，我偕同陈嘉庚先生的代表刘牡丹赴云南，了解回国支援抗战的 3000 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服务的情况，向国民党西南运输处交涉，要求改善机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。同行者还有记者陈戈丁，后来我们两人合著了《滇缅公路访问记》一书（南洋商报社出版）。接着，我以《南洋商报》特派员的名义采访国民参政会大会，会见了中共领导同志周恩来、叶剑英、博古、凯丰等人，汇报了南洋华侨救亡情况，承蒙予以重要的指示。我晋见新四军军长叶挺，他告诉我，新四军中有不少华侨青年，他们富有革命激情，积极勇敢，参加部队文化生活非

常活跃。1940 年 3 月下旬，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抵达重庆，我加入了第三分团，慰问大西北的前线与后方。团员们都想沿着陈先生访问延安的那条路，到革命圣地进行慰问，却被国民党当局软扣，未能成行。我们在西安七贤庄谒见了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同志，承林老（伯渠）畅谈陕甘宁边区的情况。林老谈到华侨青年时说："奔赴延安和边区各地的华侨青年，很爱国，很坦率，肯吃苦，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。华侨具有革命的光荣传统。由于华侨备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，爱国感情特别强烈，正是这种热情，使他们'国尔忘家'，放弃海外富裕的家庭生活，站在进步的前列。我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时，华侨'急难轻财'的印象一直留在我的心上。"林老还提出了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提法："我们要重视'海外关系'！"

陈嘉庚先生后来回忆他在延安会见华侨青年的情况说："这些华侨青年，为了抗日到延安艰苦的地方来，他们有不少是我们新加坡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的学生。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诉苦，而是满怀信心地告诉我，他们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，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。他们的处境和思想，与蒋管区的归侨完全不同。"

在 8 年抗战中，成千成万奔赴延安、新四军、东江纵队、琼崖纵队以及其它战线的华侨青年，没有辜负华侨父老的热望和中国人民的信任，他们艰苦奋斗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建国后，他们中不少人成为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，在政治、军事、外交、教育、侨务等不同的岗位上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立功。

本书所汇集的 31 篇回忆，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华侨青年的峥嵘岁月。千万华侨青年在抗战中创造的可歌可泣的光荣业绩，必将永久铭记在中国人民心里。帮助当代中国青年回顾这段历史，理解当年华侨青年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斗前进，对于激励他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行新的战斗，该是有意义的吧！是为序。

1987 年 5 月于北京

目　　录

张楚琨　序言……（1）

白　刃　到延安的前前后后……（1）
王唯真　华侨炮兵黄登保……（22）
庄　焰　烽烟寸丹——延安的回忆……（28）
张道时等　不到延安誓不停……（38）
王唯真　归国奔延安……（48）
苏　惠　去延安参加“七大”……（58）
庄国英　从泰国到延安……（65）
吴田夫　在抗日中心的狂飙里……（75）
李介夫　陕北公学生活漫忆……（86）
郭戈奇　战斗在延安的岁月……（93）
沈　光　槟城——延安……（102）
廖　冰　奔向延安　奔向革命……（110）
钟　萍　拳拳赤子心　迢迢奔圣地……（132）
许金荣　在革命熔炉中……（139）
蔡其矫　我和朋友们奔赴延安……（149）
王建华　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奔向延安……（154）
彭光涵　华侨青年与延安……（163）

屈　健　归侨女英雄——李林……（170）
王耀华　在敌人心脏里战斗……（183）
郭　凌　转战在敌伪顽包围之中……（199）

郭永绵　新四军中一战士…… (207)
谢白秋　投奔新四军…… (222)

叶　锋　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…… (227)
黄炜然　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吉隆坡队…… (234)
王　超　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…… (247)
高天雄　菲律宾华侨回国慰劳团…… (252)
张　奋　琼侨回乡服务团…… (259)
潘　照　参加越南琼侨回乡服务团…… (271)
马兴惠　缅甸华侨救护队回国参加抗战…… (275)

庄明理　滇缅公路上的华侨机工…… (286)
张智源　滇缅公路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…… (297)

后　记…… (304)

China

到延安的前前后后

白　刃*

在菲律宾，向往延安

延安，中国革命的圣地，象一块大磁石，吸引着海内外青年，投进革命的洪炉里，锻炼成无产阶级坚强的战士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

在菲律宾，我就向往延安，象游子怀念母亲，希望早日投入她的怀抱！

1935 年，我在马尼拉华侨中学半工半读。级任老师董冰如先生，是个矮矮胖胖的湖北人。（解放后重逢，我才知道他原名董锄平，1922 年的中共党员，曾参加大革命和南昌起义。）董老师在华侨中学，领导进步师生组织“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”。在董老师的培养教育下，我成了救国会的常委，参加编辑《救亡月刊》。1936 年，董老师知道我一边读书，一边做工卖报，就把每期 200 份《救国时报》交给我推销，并嘱咐我不能象卖《华侨商报》和《前驱日报》那样沿街叫卖，只能半公开推销，卖不掉的可以送给进步的同学、工

---

* 作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员。主要作品有《白刃小说选》、《白刃剧作选》；长篇小说《战斗到明天》、《南洋漂流记》；诗集《野草集》、《前进的回声》；电影《兵临城下》等。

人或店员。

《救国时报》是在巴黎出版的，报上登了许多抗日反蒋的文章，也有中国工农红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消息。报上经常刊载王明的文章，王明名下括弧里印着陈绍禹。当时我不知道王明是何人，只对他同时用两个名字感到奇怪。到延安后才听说，这报纸是中共在巴黎办的，主编是吴玉章同志。

每期《救国时报》来了，我都贪婪地阅读，象吸水的海绵，汲取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。这些理论变成《救亡月刊》的灵魂，我们常用它的观点，撰写自己的论文。

1936 年西安事变以后，董冰如老师乘年假去香港，回来后对我们说："国共又要合作了，今后要宣传全国一致抗日，不再反蒋了，要团结蒋介石的军队共同打日本。"

1937 年 1 月号《救亡月刊》，我们发表了一篇《国共合作的一线曙光》的社论，我还写了一篇揭露汪精卫（西安事变后，汪匆忙从德国归来，曾路过马尼拉）勾结日寇和何应钦，阴谋进攻西安，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文章，登在同期的《救亡月刊》上。这一期，还用了一幅绥远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抗战的照片作封面，照片上两个士兵在阵地上握着机关枪向日寇射击。《救亡月刊》是 16 开铅印本，经费来源靠刊登广告和爱国华侨捐助。

不久，听说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总部移到延安。延安成为中国的红都，成为抗日救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。

到延安去！一粒希望的种子在我的心中萌芽。怎么去？不知道，因为道路遥远，如何筹备回国旅费，回国后如何通过国民党统治区到陕北，都没有把握，何况当时还有个对我很好的女同学，怎舍得断然离开！

这时候，我已经到了《华侨商报》编辑部当学徒。总编辑是江西人来远甫、福建人于以同（这两位先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、日寇占领马尼拉后被日军杀害）。每天晚上，我学习翻译合众社、路透社、哈瓦斯社……的英文电讯，有时和记者到警察局采访社会新

闻，或到火灾、抢劫现场采访调查。从外电里，读到日寇得寸进尺，不但占领了东北四省，伪化了冀东，而且在北平城外丰台、廊坊进行军事演习，践踏祖国的土地，摧毁农民的庄稼。译电讯时，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，义愤填膺，恨不能早日回国，拿起刀枪杀敌人！

恰好有一天，叔父和两位同乡来到马尼拉，他们响应宋子文开发海南岛的号召，集资组织一个民生公司，想到那里种植热带作物。叔父说，他们不懂国语，不会说广东话，想叫我当翻译，旅费由公司负担。

我正愁着没有回国的旅费，便高兴地答应了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董冰如先生，他很赞成，并给海南岛的专员黄强写了一封介绍信。黄强原是十九路军的参谋长，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，董老师曾代表侨领许友超，到福建参加会议，和黄强有交情。

1937 年 3 月初，学期考试完毕。一天下午，我提着小藤箱，乘马车到巴石河码头。为了不耽搁师友和同学们度暑假，我只在电话里向他们告别，没有说明开船时间，自然不会有人来送行。邮船缓缓离开码头，船上的乐队奏起《一路平安》的乐曲，旅客和送别的亲友，互相抛掷着彩色的纸带，双方各拉着一端依依告别，喊着“再见”。孑然一身的我，对此情景，不由感到无限的惆怅！

轮船开出马尼拉湾，时近黄昏，晚霞映着海水，海鸥绕着白帆，风光绚丽，景色迷人。我站在甲板上，任凭晚风吹拂，最后一次欣赏马尼拉湾的落日。望着越来越远的仑礼沓公园，想到今生恐怕不会再到这异国来，禁不住伤感地哼起了《告别南洋》这首歌①。

第二天上午风平浪静，轮船在太平洋上航行。我意外地发现

---

① 《告别南洋》是上海“一·二八”抗战之后，由田汉作词、聂耳谱曲的抗日歌曲。歌词是：再会吧，南洋！你海波绿，海云长，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。我们民族的血汗，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。再会吧，南洋！你椰子肥，豆蔻香，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。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，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。再会吧，南洋！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，血流着黑龙江。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！再会吧，南洋！再会吧，南洋！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！

董冰如老师站在上层甲板上，依着栏杆望着海洋。我高兴地跑上去。董老师说，他要回湖北，是临时决定的，想不到竟在同一船上。

船到香港，和董老师分手时，我问他今后如何联系，他给我写下汉口永安堂药房的通信地址。上岸后，我找到叔父住的客栈。几天后，乘船去海口。由于有黄强专员的介绍，我们来到澹县那大镇，花了几千银元买了一片荒山野林。抗战爆发后，民生公司没有派人去开垦，那片山林也就扔了。

到南京，救国无门

在海南岛前后耽搁了两个月，5 月间，经香港乘船到厦门，遇到 3 个从马尼拉回国的青年，其中一个姓陈的同学，正在南京五卅中学读书，另外两个是店员。他们准备去南京，邀我同行。我当时充满了青年人的幻想，寻思去延安没有门路，不如先到南京碰碰运气，也许有机会转到陕北去，便答应了。

我回福建晋江县永宁老家筹备旅费。父亲原是旅菲华侨，十几岁到吕宋当苦力，后来在怡朗与人合伙开了一间小杂货铺。1933 年小店倒闭，父亲心灰意懒，回家务农。他给我筹备了几十块钱，我返厦门和 3 个同伙搭船到上海，转乘火车去南京。

我们在南京丹凤街租了一间简陋的小楼房。陈同学回五卅中学念书，两个店员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，报考航空学校，体格检查时就被淘汰下来了。我想找个学校半工半读，但学校都是全日制，而且人地生疏，没有这个可能。我们 3 人象雾海中的孤舟，找不到航向，又不愿匆匆离开，便在这个国民党的首都“搁浅”了。南京真是个大火炉，才 6 月中旬，一清早就满身大汗。我们每天在南京街头游逛，到玄武湖躺在树下看书，消磨时光，等待奇迹。

奇迹出现了！7 月 7 日，卢沟桥的炮声，震撼着祖国大地，唤醒了被压迫的民族，渴望已久的抗日战争爆发了！我们兴奋地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喊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，希望投身到

战地去。我们注意报上的广告，有个同伴想投考陆军士官学校，另一个动摇犹豫，我则坚决反对。末了，看到一则招收战地服务团的启事，一致同意去报名。报名处设在一座大庙里，门前冷冷清清，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，担保栏上写着孔祥熙。我们要报名，管事的要殷实商家担保。我对他说，我们为了打日本，从海外回来，南京无亲无故，哪儿去找铺保？我们出示了南洋的证件，管事的还是不同意，并且冷冷地说，现在汉奸到处活动，没有铺保不行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居然怀疑我们是汉奸！我们怀着满腔愤慨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

连日来，从北方到了许多难民，南京居民也惴惴不安。大街上经常出现一串串漂亮的小轿车，国民党的要人们正在开什么会议。两个同伴看到救国无门，一肚子牢骚，动了返南洋的念头。我每天注意看报纸，读着北方的战况，希望能找个机会去陕北；也想乘长江船到武汉找董冰如老师，但又怕去了扑空。刚到南京曾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却如石沉大海。我忽然感到回到祖国不如在南洋好混。在菲律宾，我 14 岁就从这个岛到那个岛，只要有华侨的地方，只要肯卖力气，不怕没有饭吃。我还在菲律宾人家中住了半年，受到很好的款待。这些经历，养成了我盲目自信和冒险的精神。但是在南京一个月，到处碰到冷冰冰的脸孔，离开钞票寸步难行，而身上的钱又快光了。一般学校每学期学杂费几十元，加上膳宿费得 100 多块，家里肯定供给不起。想做工找不到合适的地方，想救国没有门路……炎热的气候增加了心里的烦闷。

8 月初的一天，陈同学忽然跑来说，南京很快要打仗了，他们学校要疏散，他决定回南洋，问我们怎么办？同屋的两位都主张回去。南京不是久留之地，我也同意一块回厦门，再做打算。

就这样，我们离开南京到上海。上次经上海没有歇脚，这次都想看看这个大都会。我们在北站一家旅店住了几天，逛了南京路，游了外滩，进了“大世界”，饱览了五光十色的大上海。临走前一天，我们到蓬莱大戏院观看话剧《卢沟桥之战》，记得演员里有崔

鬼、舒绣文和田冲等。

8月12日上午，我们从外滩坐舢板到浦东，登上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。船上人山人海，甲板上、帆布棚顶挤满了人。黄浦江边，中国士兵正在修工事；黄浦江里，停泊着几十艘日本军舰。战火快烧到上海滩了！果然，我们船行到浙江海面，听无线电广播："八·一三"上海抗战爆发了！

望延安，路途遥远

回到厦门，我考上集美初中三年级。集美中学是陈嘉庚先生办的，学生大部分是南洋的侨生，不要学费，每月只收4元膳费。我想上完初中不成问题，总比无所事事好些，搞张初中毕业文凭，也许日后有用。

开学不久，日寇空袭厦门，威胁到隔海的集美。学校迁到安溪县文庙里，许多侨生纷纷回南洋，我跟着到安溪。福建地处海隅，与内地交通不便，消息不灵；安溪在群山之中，更是闭塞，只能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北方抗战的新闻。偶尔接到香港的刊物，看到八路军打鬼子的消息，同学们争着传阅。有一天，吴其进同学收到一本《群众》杂志，有一篇延安抗大生活的通讯，还登着招生简章。读过后，我的心立刻飞向延安，决定初中毕业，无论如何也要到陕北去。

我试着寄封信到汉口给董冰如老师，不敢公然提到延安去，只说毕业后要上北方参加抗战。真令人高兴，居然收到复信，大信封上印着"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"一行红字，复信中叫我到陕北去。反复读了信，更坚定了去延安决心。解放后我才知道，董老师当时在周恩来和郭沫若同志领导下的第三厅工作。

那时，福建泉州驻军旅长钱东亮，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侄儿。钱东亮在泉州各县横征暴敛，鱼肉乡民，抽壮丁，敲竹杠，老百姓叫苦连天。1937年寒假，我回到家乡，将见闻写了一篇《国

难严重下的泉州军政》的通讯，寄给汉口《全民周刊》。1938 年 5 月，文章登出来，我还没有见到。

有一天，李法西同学悄悄问我："汉口杂志登了一篇骂钱东亮的文章，是你写的吧？"李法西原是菲律宾侨中的同学，我用的笔名"王爽"，又是在菲律宾用过的，只得点头承认。他说："钱东亮正在暗中查访，你要当心！"

我写文章时出于义愤，有点"牛犊子不识老虎"，经他提醒，真有些后怕。想起厦门某报记者曾尤先生，发表一篇《暴风急雨话泉州》，被迫逃往香港，我把钱东亮骂得狗血淋头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怎肯与我干休？不禁暗中捏了一把汗。

暑期毕业考试结束，我匆忙回故乡。路过泉州，到生活书店，问有没有新到的《全民周刊》？售货员端详了我一阵，从柜台下取出 1 本说："总共只来了 5 本，这是最后 1 本了，要好好保存！"我付了款，感谢他的好意。

回到家里，匆忙阅读 3 月前寄出的文章，心情十分激动。同乡一位女教师来了，她曾在泉州参加过妇女军训，文章的部分材料是她提供的。她说钱东亮大发脾气，命令追查谁写的文章，让他查到就要命！她叫我赶快离开福建。

福建禁止壮丁出境，我当时 19 岁，正是被禁之列。形势不容久留，又不好明言，我只告诉父亲要去汉口找老师，对其余的人说要回南洋。父亲手头拮据，拿不出多少钱来，嫂子拿出一只金耳坠助我作旅费。临行那天早晨，父亲亲手给做了一碗面线，送我到汽车站。我觉得父亲太好了，此番出门，不知何日再见，汽车开动时，止不住流下眼泪。没想到这次分开，竟成了生离死别。

这时厦门已被日军占领，要去香港只能在泉州湾乘英国船。由于逃港的难民太多，港英当局规定，只许乘头等、二等舱的旅客上岸。我只好买去汕头的统舱票，到汕头再想法去香港。我姐姐一家在九龙避难，必须找姐姐资助，否则去不了陕北。

船到汕头，我在潮阳过夜。第二天乘长途汽车到惠阳，第三天

到樟木头，转乘火车到九龙。在姐姐家中住了几天，筹足了旅费起程。在广州遇到集美同学林有声，他和陈耕国、李金发两位同学，在文德南路租了一间楼房，邀我搬去同住。他们也想去延安，因为陈耕国得急病住进中山医院，把旅费花光了，正等南洋的汇款。前几天李金发接到汇款，已经先头出发了。

广州经过日寇大轰炸，有钱人纷纷逃往香港。人去楼空，房租很便宜。我们住的二层楼，每月只花几天的租金，其实是给房东看房子，所以有时就赖着不付钱，而且唱起电影《十字街头》中的插曲："没有钱也得吃碗饭，也得住间房，哪怕老板娘，做个怪模样，郎里格郎……"

同楼住着一个青年救国团体，经常邀我们一块上街做宣传工作，我们闲来无事，当然乐意。大家用广东话唱着《武装保卫大广东》、《民众起来打倒日本仔》等歌曲，向围观的群众宣传抗日的大道理，有时还演街头剧。

两位同学写信向家里要钱，说要回南洋，家里似乎也发现了什么，迟迟不汇款，一直等到9月下旬，才把钱寄来。我们急忙到东山百子路八路军办事处，开了一张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介绍信，立刻动身去汉口。日寇正在包围大武汉，敌机每天来空袭，听到警报，市民们成群拥往租界。我们在广州司空见惯，对敌机满不在乎。我找到永安堂药房，想会见董冰如老师，太不凑巧，他去广州了，真让人失望！

我们往西安进发，火车开到河南明港，忽然停下不走，传来日本骑兵到了驻马店的消息，大家都很焦急，幸好敌人很快撤走了。后来听说，敌军第二天便切断平汉线，我们是最后一班客车。沿平汉线各车站，都有小贩卖食品，烧鸡每只1毛钱，我们贪便宜，拿烧鸡当饭吃，把肚子都吃坏了。火车从郑州往西开，上来很多大兵。车厢里有3位湖北姑娘，挨近我们的座位，看到几个兵痞挑逗她们，其中有个姑娘叫钟国权，有意把我们当卫士，不断和我们说话，一来二往，慢慢熟悉起来。我们义不容辞，一路照护她们。到了西

安车站，钟国权给了一张纸条，写着她们的住址和电话，邀我们去作客。

出站以前，几个“丘八”查完行李，拼命盘问我们。我们藏起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，异口同声说是到西北联合大学读书，没有露出破绽，才让我们出站。

次日上午，我们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，接待人员要我们等候编队，还说从西安到延安，没有汽车，要徒步行军，叫我们尽量轻装。

在旅社等候通知，闲来无聊，给钟国权打电话，3 位姑娘一阵风似地来了，坐了一会，热情地请我们去作客。她们住在亲戚家，西北实业公司的后院，一座阔气的楼房。女佣人倒茶时，呼三姊妹“小姐”，称我们“少爷”。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称呼，感到很刺耳。玩了一阵，起身告辞，钟国权和两位堂姊妹，坚决留我们吃中饭，说是为了答谢一路的照顾。萍水相逢，盛情难却，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。下午她们又请去看电影，片名《王老五》，是部低级趣味的片子，由韩兰根和蓝苹(江青)主演。

以后几天，三姐妹天天到旅社来玩，有时出去逛马路，看电影，下小馆。从钟国权口中，我知道她父亲叫钟相毓，是国民党洛川专员。我告诉她要去延安抗大上学，她表示有机会也想去陕北。临走那天，三姐妹来送行，钟国权交给我一封信，要我到洛川亲自交给她父亲。

第一课：八百里行军

从西安到延安，徒步行军 800 华里，是我们未进抗大先上的第一课。

编队那天上午，八路军办事处发给每人一套灰色的棉军装，一顶带护耳的棉帽，一个八路军学兵队的符号，一个青天白日帽徽，听说这些都是国民政府发下的。阳历 10 月初旬，天气还很热，我

China